

# 甲午战争前中国教育改革探析

刘少雪

**摘要** 甲午战争前中国的教育改革,主要表现为洋务教育的兴办和传统书院教育的某些应急性变革,改革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十分有限。对西方文化的抵触和对近代教育的无知以及学与术分离的传统思想的影响,是当时教育改革的制约因素。

**关键词** 近代教育 书院 西学

甲午战争前,中国经鸦片战争失败的重创,很多有识之士产生了身处时代大变局之感慨,但统治阶级的上层及一般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产生像甲午战败后那样的痛彻心肺的忧患意识,从而产生改变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轨道的思想。这一状况在教育上的表现是,虽然此时已经有了一些应变性的教育机构出现,但对中国传统教育,并没有进行大的、根本性的变革。本文试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的总体状况进行分析,并探究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

## 一、甲午战争前中国教育改革的实绩与局限

第一,这一时期教育改革的实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一些曾与“洋人”打过交道的政府官员,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办起一些与传统教育不同的新式教育,诸如京师同文馆(1862年)、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广州同文馆(1863年)、福建船政学堂(1867年)、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1874年)等。

政府兴办的这些新式教育机构,促进了当时传统教育的改革。首先是教育价值观念的转变。我国传统封建教育的价值主要是道德方面的价值,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官吏;而近代的军事武备教育和方言教育的价值则主要为实用价值,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近代军事及军事工业所需的技术人才。这一点也正是近代资本主义教育区别于封建旧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

其次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下,开始部分地引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课程内容和教学形式。例如算术、几何、格致、化学等近代自然科学内容,在这些新式教育机构中是普通常见的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出现分专业、分班教学的近代教学组织形式。近代自然科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在实用的目的下,进入中国教育系统。创建于光绪十九年(1893)的湖北自强学堂是一个典型。学堂内分为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门,“每门学生以二十人为率”,“每门延教习一人,分斋教授”,各斋课程不一,方言斋“学习泰西语言文字”,格致斋“兼通化学、重学、电学、光学等事”。<sup>①</sup>

再次,这些新式的教育机构与传统书院教育制度出现了部分的分离甚至平行。这主要表现为对生徒的任用资格上。书院内的生徒想要获得国家任用资格,必须通过科举考试,而新式教

育机构内的生徒,则在完成按年设置的课程后,自动得到一种任用资格。虽然这种自动得到的任用资格在科举制度废除以前,一直低于由科举得来的资格,但它仍然表示着一种制度上的进步,即教育与国家用人制度开始分离。

2. 部分书院的掌教人或地方官吏,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对传统的书院教育进行了一些改革。

改革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沿着19世纪初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所创下的模式,在传统的经史子集范围内,探索培养经邦济国人才的教育模式;另一种模式则立足于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社会形势,借鉴已经传到中国的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在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等方面,或者对传统的书院教育进行改革,或者创建新式书院。

当时所进行的这些改革,大多属于还没有与西方近代教育进行实质性接触的、封建式的、应急性的改良措施,但与传统书院相比,毕竟是向近代教育迈进了一步。最主要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教育形式上出现了分门教学的形式。这种教学形式在清末是由阮元倡立的,“自阮文达倡立诂经、学海,乃专示士子以考证、训诂之学,兼习天算推步之术,士子各以性之所近,志其所学,学有专门,已含有分科之意”<sup>②</sup>。这一形式在许多书院得到了发扬和推广,如张之洞于1890年在湖北武昌创建的两湖书院,内部“教学分经学、史学、理学、算学、经济学五门,分由五人执教”<sup>③</sup>,这已经接近近代高等教育分科教育的实质。二是在教育内容方面突破了八股时文的局限,开始把有关实学方面的教育内容引入书院教育中。这里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以学海堂为代表的,改革的动因不是西方势力的侵入,而是出于对清末书院教育内容的空疏无用的自觉反抗,在教学内容中增加的是一些中国古代的科技内容。另一种情况则是出于保国保种的需要,有感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囫圇吞枣地把西方近代教育中的技术方面的课程内容搬到传统的书院教育之中。康有为在1891年创办的万木草堂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它的教学内容就包括了“江南制造局出版之容闳、严复诸留学生及传教士傅兰雅、李提摩太等译述之政治学和有关声、光、化、电等学科之西洋书籍”<sup>④</sup>。

第二,从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十分有限,具体表现在:

1. 参与改革的教育机构数量很少。甲午战争以前,所有参与改革的新式书院和旧书院不超过30所,新建的军事武备学堂和方言学堂共有25所,这在当时遍布全国的1800多所书院中,只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只占全部教育机构的3%,其余97%的教育机构对于变化了的社会局势无动于衷,仍然维持原状。

2. 改革的力度有限,不论是新式洋务学堂,还是在书院中进行的改革,都对阻碍教育适应社会需要的科举制度没有触及。洋务教育在其产生之时,就被限定为传统的“正规”教育体制以外的专门教育,因此,对一般士子来说,不具有吸引力。而且由于中央政府本来就没有意识到这些新式学堂本身所具有的近代高等专门教育的意义,它们仅仅作为洋务运动的附属机构而存在,既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没有按照教育规律去办,因此这些学堂的不成功是可以预料的。李端曾对这些学堂的不足作过描述:“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诸学或非试验测绘不能精,或非游历考察不能确;今之诸馆,未备图器,未遣游历,则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无自致用”<sup>⑤</sup>,对中国传统教育模式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同样,由于书院本身无法抵御科举制度对于院内生徒的诱惑,在书院中所进行的改革,力度也非常有限。

3. 改革的深度有限。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从根本上说,不是由从事教育的人员发起的,

而是一些对西方世界稍有了解的封疆大吏和对时局的变化有所了解的官绅发起的。因对八股制艺式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有所不满,才提出的应急性的改良措施。因此,不论是所设学校的类型,还是所添加的实用的课程内容和带有近代意义的教学组织形式,大多属于表面文章,没有触及到近代教育的实质。以当时所出现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为例:课程引进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引进科学本身,而是把它们作为“制铁船、造火器,以制胜强敌,谋富强救国之策”<sup>⑧</sup>的工具,因此就免不了把一些名词、概念当作科学本身,而忽略了科学做为“人类知识的一个主要类型及一种主要的文化体系”<sup>⑨</sup>所具有的更为广泛与深刻的意义。教学中所沿用的,也仍然是传统的不注重实验的死记硬背。可以说,近代课程走进了中国,但科学教育还未进入。

## 二、甲午战争前中国教育改革的制约因素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传统教育置身于巨变的时代,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其根源主要不在于教育的内部,而在于整个社会对于这种巨变的不敏感及不适当反应。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对此进行分析。

第一,长期的闭塞与自大,使得大部分的中国人在遇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时,始而震惊,继而愤恨,无法保持一种平衡的心理状态,冷静地看待西方的技术文明优于中国的现实。

这种不冷静的心态,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一是拒不承认西方近代文明优于中国的传统文明,最典型的表现是对已涌入的西方文明视而不见。有研究发现,19世纪末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大儒中,很有一批人几乎完全生活在传统的精神世界里,他们的思想方式与学术建构很少显示出受西方影响的迹象<sup>⑩</sup>。二是在与西方文明的短兵相接中,不得不承认西方的优越,但仍不肯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与体面,把树立民族尊严的支点架在“西学中源”的基础上,例如1865年恭亲王奕訢等在上奏请同文馆设天算馆折中说:“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特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sup>⑪</sup>虽然有的人强调“西学中源”,是把它作为将西学顺利地引进中国的“垫脚板”,但更多的人是把这种说法作为拒绝深入探讨西学的借口。三,还有部分人因对西方先进技术的仇恨与嫉妒,即使意识到了西方技术的先进,也拒绝俯身学习。大学士倭仁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他在反对同文馆招考正途出身的人员学习天文、算学时说:“夷人吾仇也。(他们)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未有之辱……今复举聪明俊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sup>⑫</sup>这些表现都说明了中国士人在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时,情绪反应代替了理智思考,妨碍了中国学习西方的进程。

由于情绪反应代替了理智思考,当时士人中的许多人不肯从内心里承认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现实,更不用说像日本那样迅速作出借鉴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来促进整个社会进步的理智抉择。即使如身为出国公使的刘锡鸿,在参观了西方国家的学校以后,仍然认为“所谓西学,盖工匠技艺之事也”,而这种“一器一技”之教育,会使其国人们“一意讲求杂技,使趋利之舟车、杀人之火器,争多竞巧”,远不如中国之能“维持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五伦”的“圣人之教”的作用为大<sup>⑬</sup>;因此,中国根本没有学习西方、模仿西方教育制度的必要性。这种观点并不是个别的,而是甲午战前盛行的思想主流。

正因为此,在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虽然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但多数中国士子仍然

寄希望于“圣人之教”最终能够不战而胜于西方国家的“技艺”之教。这种思想是妨碍 19 世纪的中国人认真考察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的实质的最大阻力,是延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主要原因。

第二,学术分离的传统思想意识,妨碍了近代科学精神及科学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扎根。

孔子的“君子不器”的名言,在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学而优则仕”中的“学”,也仅仅是指对经史子集的“形而上”的体认。严复曾对中国的传统学术内容,进行过这样的批评:“大经不离言词文字而已。求其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如西人所谓学于自然者,不多遘也。”<sup>②</sup>即使如明清之际所出现的实学派,他们的研究内容,也仅限于对传统经典的考证研究,仍然没有真正关心认识自然。这一时期中国虽然也有了一些科学成就,但人们对它们的发现和运用,主要是基于它们的实用价值,而不是科学研究本身。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近代科学之间除了内容上的差别外,在治学方法方面还存在着根本差异,这主要表现为:西方近代科学研究,注重在大量实验基础上的归纳、演绎,因此,在教学中很强调实验方法的运用;而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则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虽然在中国古代也已经出现了演绎法、归纳法,但它们由于缺少实证的前提,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只局限于思辨的范围。这种传统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虽然也有书院及新式学堂引进了部分西方近代的课程内容,但它们不可避免地又落入到记忆、背诵的传统教育的窠臼。纵观这一时期有关这些方面的改革与引进,对于大多数书院来说,仅仅是浅尝辄止,既没有设备的增加,也没有方法的改进。曾到日本游历过的黄庆澄在长崎寻常师范学校见到一套几何教具,大发感慨:“几何形体器具,最便于学算之用。庆澄向习几何,即闻西人有此器,无处觅购;现得全阅一过,为之一快。”<sup>③</sup>所以说,此时对于西方近代科技的引进,只限于外表的而非本质的。无怪乎当人们决定把西方近代课程内容引进中国时,还要反复申明这种行为不会造成与传统教育思想间的冲突,不会把士大夫所不屑为的“工匠技艺之事”强加给他们。同治五年(1866),恭亲王等所上的奏设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折,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其中说到:“或谓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臣等尤有说焉,……盖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礼,理明而用宏焉。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有何疑焉。”<sup>④</sup>

这种仍然固守着的学术分离的传统观念,说明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近代科学及近代科学教育的陌生与不理解。虽然中国在科技史上也曾出现过辉煌,而且直到 16 世纪,中国的科技一直领先于欧洲,但需要明确的一点,古代科技与近代科学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异。这在近代,就表现为东西方科学之间的不同性质。有关这一点,前有徐光启,后有曾纪泽,都做过论述。归结为一点,就是中国古代科学大多是片段性的、以应用为主的非系统性的知识,学者们往往“徒眩其法而不知求其理”;近代科学则是“不言法而言理”<sup>⑤</sup>,追求基本原理,“不用为用,众用所基”<sup>⑥</sup>。因此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必须进行有关近代科学观念及科学教育思想方面的补课。严复对此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西人“教其子弟也,尤比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中土之学,必求左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sup>⑦</sup>。由于教育观念上的根本差误,人们引进西方近代教育内容与方法后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三,有关西方近代教育方面的“西学”,传播的范围不广,影响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也都极为有限。

虽然中国人开始接触西方教育制度的时间并不算晚,早在明末清初第一次西学东渐时,就有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Julius Aleni)撰写《西学凡》一卷、《职方外志》五卷,对于欧洲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都有详尽的介绍。但因为当时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都显示出虽与西方不同但并未落后,甚至于更先进,因此,此时介绍西方教育制度,并非要把它引入到中国传统的教育领域中去,而只是为中国人提供一种远观、把玩、欣赏的“景物”。

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的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也通过西方传教士和早期出国游历的人传到中国来。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介绍有关近代教育理论的工作,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高潮。据统计,从1869年到1876年的7年时间里,在《中国综录》(the Chinese Recorder)上只有3篇讨论教育的文章,而从1877年到1890年的14年里,此类文章则增加到32篇;专著则主要有花之安(Ernst Faber)的《西国学校》(1873),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的《振兴学校论》(1881),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新学八章》(1887)、《七国新学备要》(1892)、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的《西学考略》(1882)等。早期出国游历的中国人,在见识到西方教育制度方面的优越性以后,也开始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教育制度。容闳于1860年向太平天国建议仿照西方颁定各级教育制度,严复翻译了欧美教育制度章程,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对日本的教育做了介绍,郭嵩焘在日记中则详细记述了他对英、法、日等国学校及相关制度的考察。

由此看来,当时的中国士人对西方的近代教育已不陌生,但从总体上说,这些介绍并没有对甲午前的中国的传统教育产生大的影响。有学者指出,19世纪40年代以后从通商口岸兴起的变革之风,差不多没有触及到大多数书院中长期不变的知识生活<sup>⑥</sup>;书院中的士人,仍然在“科举制度中讨生活,长期封闭,不与外界接触”<sup>⑦</sup>。就连地处沿海通商口岸的广州,在19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书院如学海堂、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也还没有引进西学,更遑论处于中西文化冲突外围的内地书院。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因为,不仅是教育方面的,就是一般的西学,在当时的传播也非常有限,有关西学方面的书籍的出版量和发行量,不足以对当时的中国士阶层产生大的影响。据估计,江南制造局从1868年开始翻译西学书籍,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共印书三万多部,售出仅一万多部,而在1840年全国有府学生员74万人,按这一数字计算,约70人才有一部西学书籍。这就难怪后来成为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梁启超,也是到1890年才开始接触西学。由于社会上的广大知识分子对于西学普遍陌生,西方教育理论与制度的传播没有在中国教育界中得到相应的反应,就很自然了。二是科举制度的继续存在,也妨碍了中国传统教育在制度与内容上的改革。以当时的新式学堂为例,直至1892年,郑观应还说“世家子弟皆不屑就,恒招募萎人子弟及舆台贱役之子入充学生”<sup>⑧</sup>。即使做了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并不放弃对科举功名的追求,上海和广州广方言馆的学生,虽然领取了津贴以学习英文和数学,但仍“为准备应乡试而在那里练习作八股文”<sup>⑨</sup>。这也就说明了科举制度的存在,使传统教育的改革缺乏中国士人的社会支持。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50年时间里,中国的传统教育与整个社会一样,虽然在外力的冲击下,不得不对延续二千年之久的发展路径有所改变,但由于当时人们对以战争形式表现出来的中西方之间的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文明文化的撞击,缺乏冷静的理性的分析和思考,尤其是对西方近代科技及科技教育思想的迟滞的认识,这种转变又是异常的缓慢。只是在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打碎了中国人残存的脆弱的自尊和自信后,中国人才从思想心理的深层次上,开始了艰难屈辱的借法图强的历程。但遗憾的是,甲午之前的50年,几乎

没有为其后必须刻不容缓去进行的各项社会改革做好准备,改革困难重重。教育改革,需要思想准备、舆论准备、人员准备以及知识准备,由于缺少这一系列的准备,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注:

- ①③⑨⑩朱有璘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07、593、15、589 页。
- ②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考略》,见胡适等编《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上海书店 1990 年影印本,第 284 页。
- ③④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9、230~231 页。
- ⑥⑭⑰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华书局 1929 年版,第 279、56、281~282 页。
- ⑦见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载《历史研究》1996 年第 6 期。
- ⑧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596~609 页。
- ⑩《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七,故宫博物院 1930 年影印本,第 24~25 页。
- ⑪⑬⑮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45、383、296 页。
- ⑫严复:《〈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序》,《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37 页。
- ⑬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略》,见胡适等编《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第 410 页。
- ⑮费正清等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83 页。
- ⑰苏云峰:《近代中国教育思想之演变》,见王戎笙主编《台港清史研究文摘》,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43~344 页。
- ⑱费正清等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68 页。

作者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洪峻峰

(上接第 96 页)

- ⑭赵洋:《全国政协委员杨国桢倡议:建立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学》,载 1997 年 3 月 4 日《中国海洋报》第 2 版。
- ⑮杨国桢:《序》,载《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2 页。
- ⑯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07~160 页。
- ⑰参见:“Introduction”, *Economic Anthropology, Reading in theory and Analysis*, ed. by Edward · E · Leclair, JR, Harold K · Schneider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68. p3、7、8

作者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讲师 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陈双燕